

专题论文：马华文学

Feature Articles: Mahua Literature

国之将临，告别往昔： 方天在《蕉风》的现实主义书写 (1955-1957)

Farewell to the Past, the Presence of Nation: The Studies of
Realism Writing by Fang Tian in the Magazine *Jiao Feng* (1955-1957)

贺淑芳

(HO Sok Fong)

摘要

方天（张海威）于1955至1957年间短暂居留马来亚。他居留新加坡期限，担任《蕉风》的首任编辑，同时大量创作写实主义的小说。他在独立的两年前途经马来亚，在此历史关键时刻，参与了当时集体澎湃的在地认同氛围，乃至创作、撰写艺评讨论马华文学的主体意识，甚是投入。在马来亚独立过后，《蕉风》与《学生周报》的出版社与印刷厂迁至吉隆坡八打灵，方天也离开马来亚。以后是否还有创作，至今仍未得知。但这两年“途经”与“停驻”马来亚的时期，不仅给他个人，同时亦给马华文学史留下精工细笔与在地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值得仔细阅读，观察其书写如何处理本土认同、阶层关怀及个体意识。可兹补充过去被忽略的非左翼现实主义研究，以及《蕉风》的现实主义研究。

关键词：方天、本土认同、离散、现实主义、南来文人

Abstract

Fang Tian (Zhang Hai Wei) stayed for two years in Malaya from 1955 until 1957. During his residence in Singapore, he held the position of the first editor of the magazine *Jiao Feng*, and wrote a lot of short stories in the realism mode. Malaya was an important station for him with the historical moment of independence around the corner. During the two years of his residence in Malaya, Fang Tian identified with the collective passion that had advocat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locality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to which Fang Tian has responded through short stories, scripts and critical writing. After the independence, the press headquarters and printing factory of both magazine *Jiao Feng* and *Xue Sheng Zhou Bao* (The Student Weekly) moved to Petaling Jaya in Kuala Lumpur. However, Fang Tian did not move to the new office in Petaling Jaya, instead he left Malaya afterwards. Whether had he continued to write is not known; there are no other writing by him been mentioned since then. However, for these two years of his residence in Malaya, he had left a lot of localized writing in realism which became the important material for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1950s. The writings are worth close reading, to observe how the writing construct the local identification,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ies on Fang Tian also provided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for the non-leftwing realism writing in the magazine such as *Jiao Feng*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studies.

Keywords: Fang Tian, Local identification, non-leftwing, realism, migrant-literati

一、前言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转移，中共执政，国民党败守台湾。左翼人士北返，右翼人士南来，马来亚联合邦甫于前年即1948年成立，英殖民政府宣佈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实施紧急法令，并切断马来亚与中国之间的书籍与两地来往。（潘碧华2000）紧急状态从1948年延续到1960年。这期间进入新马一带的华人，多途经港台两地。南来文人在香港托庇、觅职、交往而来的文化互动，也随著他们的迁移踪迹延伸到新马一带。

方天在1955年随同申青（原名余德宽）自港抵新，成为《蕉风》的第一任编辑。从1955年11月开始创刊出版的《蕉风》，打著“纯马来亚化”文学旗帜开张，对地方的认同感快得惊人。

其时中国大陆周恩来为与周边国家示好，与东南亚国家签约取消海外华人的双国籍，并鼓励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融入当地社会（Leo Suryadinata 2007: 96）。东南亚的华人由此面临只能选择“一个国籍”的局面。在马来亚，联合邦的英殖民政府与联盟达成内部协商，华人可有机会获得公民权、可以投票选举。新马联盟政府掀起马来亚化运动，口号如“爱马来亚”、歌颂“种族和谐”等，也频密地出现在当时的诗歌与小说中，足见当时爱国意识之盛。¹ 基于英国围堵共产党的各种行动，包括把胶林区的华人迁居新村的计划、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以及新村华人长期疲于紧急法令状态，共产党难以在此形势下继续保障华人在本土的利益。当时英军围剿共产党，对华社团体而言，左翼的言论与中国色彩变得极其敏感，且需要去除、甚或划清界限以避嫌。《蕉风》认同马华文学有发展“纯马来亚化”的需要，其实也是受到冷战时期英军围剿左翼、以及新马联盟政府在鼓吹国家独立的各种宣言、运动造就的局势、马华文学广泛认同本土的主流趋势所致。²

如张锦忠所言，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其实乃是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离散南来之后，“减轻其社会主义或淡化中国链接的‘本土化’做法”。³ 在二战以后，“本土化”乃因民族运动兴起、冷战时期左右对峙的形势与国籍问题等等多重复杂的因素所造就。独立时建构的“国家意识”，既带来本土意识（以此来建构/想象反殖民的主体地位），但同时也带来压抑。⁴ 当时的“客观现实主义”的论述乃是由阶级斗争、国家意识、文学反映论与实用论等综合而来，凡是与此迥异的文学观点，都被排拒。

在以多（赵戎的笔名之一）〈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一文中，作者回顾1951至1959的文坛“沈寂期”，提到“由于政治的原故”（即英军压制共产党的行动），使得左翼的文艺空间亦遭约束。该文提及这段时间南来的港派文人，只说他们“乘机南下掘金”、“大写黄色和准灰色的东西”（以多1959: 12）。然而隐去姓名，不知所指为何人。

当时从香港南来的文人除了有随着申青到来的《蕉风》诸人如方天、姚拓与黄思聘之外，也有非属《蕉风》的刘以鬯（编辑报章副刊）。黄思

聘任蕉风编辑时，亦邀在港文人助阵，刘以鬯所编的副刊版位，呈现出香港与南洋两地的都市生活、消费、娱乐、文化特色，或谈男女两性观点等软性文章，其版位的风格较为轻松，而难以被具有“爱国意识的现实主义”者纳入其所认可的“现实”视域当中。

无论如何，阅读《蕉风》刊物中方天的现实主义小说，怎样都离黄色文学与灰色文学很远。检视英殖民地末期至建国独立这一时期，出现在非左翼刊物《蕉风》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啻补充一块长期被马华文学所漠视的拼图。以下本文将方天的在地书写为主要讨论范围，看其现实主义的书写如何理解与再现本土。

方天（原名张海威）是前中共领导人张国焘的儿子，在父亲脱离中共以后，便随父亲迁至台北和香港。香港独具特殊而自由的文化空间，可说是撮合一群创办《蕉风》编辑的重要地点。⁵方天在香港时曾任《中国学生周报》编辑，而申青则为《中国学生周报》的社长，《中国学生周报》是香港的反共刊物之一。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另一位编辑姚拓在港居留时亦曾任《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辑。据他回顾，当初编辑《中国学生周报》，由于不谙广东话，而香港的中学都以广东话为教学媒介，“只能纸上谈兵，却无法和香港的中学生们直接沟通”，故迁移到新马编辑《学生周报》（姚拓2005：561-562）。《蕉风》的另一位编辑黄思聘，曾和力匡、夏侯无忌、齐桓一起在香港编《人人文学》，后者亦被视为右翼刊物之一。⁶

《蕉风》出版后，最初是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及发行，由“中国学生周报星马办事处”代理。自1956年6月第16期开始，才改由“新嘉坡友联书报发行社”发行。“新嘉坡友联书报发行社”是由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在新马设立的分行。⁷根据前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处长所言，香港的友联出版社是“由一群热中‘第三势力’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不喜欢国共两党。”（高全之2008：224）尽管如此，基于与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与“香港友联出版社”的密切关系，新加坡的友联与旗下杂志《蕉风》仍被左翼目为反共的敌对阵营，并在出版后遭到左翼的攻击与杯葛。

方天在新马只待了一或两年左右的短时间。1958年《蕉风》搬到吉隆

坡时，他随父亲移民到加拿大教书（姚拓2005: 570）。过后方天的编辑任务改由南来文人黄思聘、黄崖以及姚拓等先后担任（谢诗坚2009: 195）。虽然他居留在新加坡的时间如此短暂，然而他在《蕉风》发表写实主义的作品在质与量都相当可观，以下将先讨论《蕉风》的在地视域与现实主义论述，再讨论1955至1957年间方天刊于《蕉风》的作品。

二、方天与《蕉风》的在地视域

在此要讨论《蕉风》作品中的语言混杂与流动。关于中文与他族语言、多种方言混合而失去“纯正”的焦虑，这问题也曾出现在一个中学生的读者来函中（1956年第16期，微尘〈关于用方言写作的商榷〉）。《蕉风》编辑表示欢迎其他读者来稿讨论或论战，虽然稍后未见响应，然而随后接下来每期刊登的小说仍有颇多“在地化”的中文（不少是由方天与陈振亚所写），以与他族混杂的语言、形形色色的乡音方言，来描摹殖民地人物、角色以及在地流动的语言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蕉风》编辑有如姚拓者，并不谙广东话，难以用广东话与香港的中学生沟通，但是编辑与作者当中也有如方天与白蒂（白蒂为陈振亚撰写小说的笔名）者，对方言（包括广东话、客家话等等）抱著浓厚的兴趣。都市中汇聚多种方言腔调，各色音调潮涌，纷扬新马殖民地独特的氛围。乡音与在地化用语的混杂特质，在方天的小说中尤为鲜明。

比如在〈豆腐档边〉（1955年第3期），小说以一名在摊档抹桌子的工人为第一人称的视角，呈现出都市中汇聚不同籍贯小贩的摊档空间，各色乡音混杂穿梭往来。无论是第一人称内心叙述的声音、或是各个角色（摊档老板、顾客、工人）在现场的对白，叙述者皆致力揣摩，选择恰当的语词以趋近多种方言的音调，如接近客家话的“转来”（回来）、“爱”（要）。在另一篇以码头苦力为背景的〈十八溪墘〉（1956年第7期），则有颇多福建腔的发音，羔杯乌（咖啡乌）、汝（你）、勿歹（不坏）、什么郎（什么人）、令伯（我）、拍谁（打谁）等等，大都出现在

小说对话的句子中，对话以外的描述与叙述部份则尽量采用标准正统的中文，形成纯正中文与在地语言平行共存的空间。在以锡矿为主的〈暴风雨〉中则也有颇多广东话，如禀个（谁）、唔该（请）、添日（次日）。

方天的小说相当用心地依据小说内的时空、人物身处的位置与其工作性质，尽量选择可能符合在该情况下会出现的方言，试图复写一个对作家而言或许是相当新颖的、充满冲击性的、非纯中文、非单一且是多元的语言经验。但是，方天并非每一部小说的语言都出现在地化的混杂特色，他在这方面的考虑相当节制而谨慎。他在这两年间撰写的小说，几乎遍涉新马一带的华裔工人从事的各行各业，想象他们在谋生求存中所遭逢的各式挫折为其小说核心。他在书写劳工的身体经验上，常展现出颇有独到的观察且不乏出色的细节描写。正如他在仔细想象人们不同的工作环境中，会体验到的特殊的身体经验（这点稍后再论），小说中的语言音色亦随着工作场合而加以特意抉择。在〈排字女工的日记〉（1956年第21期、第23期）中，或许因为排字女工是属于受中文教育且对文字敏感的阶层，这篇小说中多为书写语言，而非交谈的语言（这点也相当符合小说中排字部女工标榜的，拘谨发言的性格），少量的对白以及第一人称的内心叙述，皆为正统标准的中文。在另一部以金然为笔名书写鞋店店员的作品〈我的博士论文〉（1952年第28期）中，以及两个文人之间的调侃对话颇多的〈预感〉（1957年第30期）中，文中的内心叙述与对话亦采取标准的中文书写。

从《蕉风》早期刊登的文章中，隐约浮现“在地”和“侨民”之间竞逐的观点。在《蕉风》早期的文章，“侨民意识”与“在地意识”同时并存。《蕉风》意欲实现的“纯马来亚化”文学观，必须与盘踞读者群中（甚至是编辑与作者群中）的“祖国”观念竞争或共存。在文学上认同的本土转向，并不必然与国家情感的认同一致。⁸

在一篇典型批判资方的小说中，华卿〈理发椅上〉（《蕉风》1956年第13期），一个来自湖南的中国人与剪发女工（当地娘惹）之间展开一段对话，小说意图透过这番对话揭露当地女工被资本社会剥削的堪怜处境，但个中也流露出“新客”观看在地出生的华人为他者的优势意识（这优势

同时又与顾客与工人、问者与答者的身份对应)。“回归祖国”与讲好中国国语为当时普遍深植南洋的观念，即便是土生土长者亦有者把中国当成祖国(如新加坡作者紫燕刊于1956年第13期的游记〈马来亚去来〉)。藉由认同“祖国”，文化传统与跨地的族群情感被归属联系为一体，然而以中国性情结来联系的“共同体”，也受到祖国(文化起源地)为中心(正确)、而南洋为边缘(错误)的理解框架所限。

《蕉风》试图接近本地人的视域，乐于透过辩驳、响应来改变或扭转上述中心/边缘的关系。比如在1956年21期的“蕉窗闲话”版里，申青有一篇〈唐山何处?〉讨论静子君〈我刚从唐山来〉，后者刊于《南方晚报》所编印的征文文集《马来亚之恋》，否定当地“娘惹”将“唐山”指称“祖国”(即中国)的用语。⁹申青的反驳虽然仅是略论“当地人脑海中‘唐山’的地理概念”，却也显见他为《蕉风》策划马来亚化，非仅是寻找蕉风椰雨入文聊表其事而已，他试图认识、认同当地的语言与语汇。正是透过语言或语汇，来实践产生“纯马来亚化”的认同。

殖民地具有混杂特色的语言，是否适宜“反映”或如何“反映”，曾引起一些主张“纯中文”者的焦虑。从《蕉风》1956年第22期这场“再谈马华文艺座谈会”曾围绕马华文学在地语言的混杂特性展开辩论。一些作者如重阳提出当地语言“融洽一炉”当为殖民地不可忽略的区域色彩，子凡主张马华文学需要突显在地的“区域特性”或“个别性”，以超越中文文艺的“一般性”，都是当时马华文学寻求主体性地位、脱离中国文学打开的空间。一旦在文学创作中采用殖民地混杂的语言创作，便已经是在表明、涉入认同本土的文学主体生产过程。

如Iain Chambers所言，在后殖民的语境下，迁移者总是在这过程遭逢他人的文化、语言与地理空间等冲击，主体的认同感与视角也就因此经历到不断被形塑以及再形塑的过程(Iain Chambers 1994: 24)。《蕉风》草创时期对在地充满正面期盼浪漫的语言色彩，试图通过培植在地的隶属感而催促“纯马来亚文化”文艺主体的产生，固然此认同的口号宣言看似过于确定，然而探索何谓“纯马来亚化”，乃是为多重意欲加以诠释、形塑、生产、创造而非先验本质或已经定型的事物，尤其迁移者来到新的环

境之后，他本身对这殖民地而言，就是既存“混杂”的要素之一（Lippard 1997: 5-6）。在1956年“再谈马华文艺座谈会”中，语言，以及由在地混杂的语言带来的冲击，使得各种既存的观念（比如文学语言）被翻新。文化的认同与疆界也游移浮动，对于文化母体、国家、语言与文学的认同，因流动而带来更多断裂、分歧与重塑，如何认同，怎样认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如张锦忠所言，“地方感性”为马华文学带来创新的书写生机，又是再塑马华文学文化主体地位的语言特质（2004: 55-67）。在当时写实主义的创作中，在地的中文语言渗透到书写语言，不啻为一场从“身体”在地生活的经验，过渡到写作中，启迪翻新语言的实验。

三、“纯马来亚化”现实主义的观点

尽管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中，改革的最终是要“解放”写作的阶级属性，然而，始终不能否认的是，写作总是属于受过教育、具有书写能力者的活动，寻找那些时代“典型”的形象（比如叙述惨遭推入火坑的女性、或无法享有上学机会的孩童、或遭到雇主剥削的工人等），也意味着写实总是对于他人的观察、注视着某一阶层的生活与经验，而加以抉择的再现。即便语言的风格、小说叙事的观点与结构的组合成功缔造出幻若来自穷苦阶级发声的效果，它仍然是经过文字、符号布置、叙事元素与语言风格所修饰虚构，且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所主导、抉择的视角。¹⁰然而，马华现实主义长期以来的观点，却是相信有客观的现实为标准，并要求在客观反映现实之余再加以批判。¹¹

在创刊早期的一、两年内，《蕉风》也有几篇偏向社会主义性质的评论，如知微在《蕉风》1956年第21期发表〈文艺与现实〉，所强调的不只是“反映论”，而且相当信仰文学有实用功能，要求文学“改造”现实，负起改革社会的积极义务。这类非属文学范畴的要求，在创刊两年后也依然出现在当时针对方天作品的读后感中，把提出“解决现实问题”之道，视为小说应有的表现之一（见杜明在《蕉风》1957年第42期〈“烂泥河的呜咽”评介〉）。故此，早期《蕉风》杂志内发表文学观点的作者，其实

并不完全与左翼的现实主义观点隔离，甚至还颇为叠合相似。

这种文学改造论的观点，其实也是《蕉风》“纯马来亚化”论述的奠基石。如马摩西〈文艺的新使命〉一文，提出透过翻译，可以追溯马来民族的“文化源头”（如阿拉伯文化）、“把马来人的生活——以报告文学写实的手法报告给读者知道”，认为如此便有助于塑造“纯马来亚”的文化，以及提出文艺创作也是建立种族沟通最佳的入手方式等等（1957年第36期）。

陈振亚从1957年第30期至34期之间发表的一系列文艺评论（以白蒂、沙里明为笔名），以及他在稍早以洛萍为笔名发表的评论〈小说题材的处理与运用〉（1955年第3期）、〈创作的动机与目的〉（1956年第28期）呈现出倾向纯文艺的观点，集中讨论创作面对的各种问题，如经验、语言、内容与形式等等，从中西文学引经据典，举例比较，颇见教育读者或提升文学知识水平的用心。

虽然如此，当他在座谈会中谈到马华文艺观点以及本土文学创作的问题时，却也流露出五四文学的思考脉络与观点，比如认为马华文学根基在反殖、反种族、反头家主义的精神：“马来亚的封建残余是和洋化精神——也就是殖民地主义，结合成一体”（1956年第20期〈漫谈马华文艺——文艺座谈之一〉），要完全产生一个全新的视野是非常困难的。他借用从五四文学运动拯救民族、匡正弊俗的观点，在多篇以白蒂署名的小说中，以各种作者所观察到的、在殖民地华人社会之中焦灼的议题为题材。比如他批判那些阻碍华裔移民融入在地现代社会而无法“进步”的原因，包括种族猜疑、族群偏见以及传统遗留的糟粕习俗等等，他将这些原因都视为必须搏斗予以纠正的弊病或敌人。

在〈还我的孩子来〉（1956年第9期）、〈渣滓〉（1956年第14期）这些小说中，传递相当鲜明的反殖意识、对积弱成病的民族感到焦心，以及关注现代化使移民华人社会内部的文化变迁、道德价值崩解等等。如〈还我的孩子来〉，叙述者对英殖民地政府的现代法律制度甚感不以为然：

在一个奇异的地区既然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法律，可以使许多好人

的生活获得保障，也可以保护坏人为匪作歹，自然就有许多依靠这种不可思议的法律为生的杰出人物。（1956年第9期）

看不顺眼的原因在于，“这地区奇异法律最精彩的一部分就是‘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惯’”即准许鸦片公卖与三妻四妾（1956年第9期）。他批评殖民者的法律漏洞假现代与尊重之名，实际上却庇护了传统的糟粕，予民族弊病继续孳长的空间。在小说《渣滓》中，他叙述了一场荒谬的闹剧。在新加坡开始纳入民主体制之际，烟馆意欲推出“黄皮书”，借用民主包装不伦不类的名堂，试图为吸食鸦片的文化在现代国家的体制中保留正当的位置。

以上马摩西、陈振亚两位文人，乃是和方天为同时在《蕉风》创办初期积极写作的文人。方天较集中火力写小说，文艺评论极少。其文学观点多见于一系列文艺座谈会的纪录（以方天或辛生之名发表），有关诗歌与戏剧的观点尤多。¹²他对有国籍的“马华文学”以及一个未来能够融入各族的“马来亚文学”洋溢乐观之情。正如方天本身所意识到的，当时马来亚正面临“伟大”的关键时刻，此值得期待的马来亚文学正在诞生。确实，他谈的不仅是马华文学，而是马来亚文学：“至少应该做到，把马亚与马印的文学翻译到马华文学中来，也把马华文学介绍到马亚与马印文学中去。”（1957年第29期）他认为透过翻译，可以突破原有的疆界，可从他族的文学成果中找到让彼此交流、刺激、互动而来的创作可能，帮助作者超越囿限自身族群的视域，以产生更具特殊性的马来亚文学。这是当时普遍上鼓舞南来文人的文学想象——他们从殖民地的混杂与多元文化互动中，看到有别于故地中国文学的创造生机，相信若能跨越不同种族、语言作品中的视野，可以刺激创作使之更有活力。对于要在此地另外建立新的文学主体，他们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事实上，在当时他们对这区域的文学主体及未来，所抱持的信心比起今日甚至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申青之语：“多产生些饮誉国际文坛的马来亚文艺作品，正是今日马华文艺工作者所应该努力的。”（1957年第29期）

乐观、正面，大抵也是当时《蕉风》在鼓吹纯马来亚文学所强调的特

色。申青在〈一九五七年马华文坛的展望〉中，便意识到因为国家独立而将迎来“新兴‘独立文艺’”，大量引用当时对国族建构有正面期待的话语（“恢复民族的信心”、“融洽民族的情感”），他认为马华文艺工作者肩负双重使命，首要任务当为“冲淡颓废伤感”、“创造新生奋发的文艺”，以便能“给一个新兴的国家铺好稳固的心理基础。”（1957年第29期）

当时文坛主流上抵御或掀起反灰反黄的运动，对伤感或颓废的文学不予认同。《蕉风》以大量热烈的语言来酝酿迎接独立、积极欢跃的氛围，除了“正面”的语言比较能够达到振奋、呼吁集体认同的效果之外，亦是由于文坛普遍上反灰反黄的大势所趋之故。

不过，虽然《蕉风》在创办初期认同振奋乐观的正面语言，并没有因此否定个人或个体性的书写，对国家叙述也仍有批判与质疑的空间。在《蕉风》杂志中一些作者如马摩西虽然也宣称崇尚去除伤感、鼓吹乐观的语言，却也写了不少个人在地的日常生活经验、记叙“以我为中心”的日常琐事，那些散文里竟然全无他在公共论述中的呼吁性，可谓为当时离散南来者的“小叙述”，不过这将另作他论了。¹³

四、阶级的身体与稍现即逝的个体意识

方天在《蕉风》内的创作，除了写实主义的小说之外，也有不少童话创作和地方叙述的作品。在此仅讨论他的现实主义以及与地方特性相关的作品，他的笔名甚多，还有“阿琼”、“辛生”和“金然”等名，后来都一律以“方天”正名，收录于195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烂泥河的呜咽》。

他的写实小说多集中于描绘华裔低下阶层的生活苦况，如〈胶泪〉、〈豆腐档边〉和〈暴风雨〉等等，所叙述的对象包括割胶工人、小贩、锡矿工人等各行各业的苦力。若按现实主义惯常的说法，方天的作品可说是实践了写实主义的任务，即“批判”阶级之间不对等的权力，也“刻画”这区域的华裔劳工挣扎求存的面貌。在他笔下，低下层阶级也可再分成不同的等级。他有几篇小说描述在都市消费空间（如百货公司）里工作的店

员，但他对这些工人的再现，都不若对“苦力”寄寓较多同情。

方天叙述苦力或劳工的小说，都写得颇为细致，表现出超乎《蕉风》其他小说作者的写实水平。白垚形容他的写实主义小说是“写实主义的真品”，同时与为“政治服务的写实主义”小说完全不同（2003）。小说内还有大量经由观察（或考察）而来的细节，无论是对码头、街巷小贩、锡矿抑或船厂的场景描绘，相当具有实在感。如他以另一个笔名“辛生”发表的短篇小说〈烂泥河的呜咽〉（1956年第24期《蕉风》）从开首第四段开始，小说描叙沿着河边的场景铺陈出各种纷繁多样的动静，透过声音、光线、视觉、物质流动的速度与节奏，构塑出以主人公为中心所感知到的、河岸两旁船厂的场景。

方天“刻画”华裔处境的小说充满沉重与悲痛之情，比如在〈胶泪〉（1956年第2期），一大片黑漆漆的胶林，充满不可解的杂音，有如主人公少年胶工对未来就学的前途感到彷徨、迷惘的心灵空间。

〈十八溪墘〉描写码头苦力的日常生活空间（1956年第7期），沿着肮脏布满油污的新加坡河，这道新加坡河除了是穿过都市重要的地理标志之外，同时也是把此区域的阶级加以划分的空间界限。¹⁴ 小说的视角从一开始就俯瞰贫穷阶层的居住空间，呈现出狭窄凌乱的屋宇、码头苦力负载重物疲劳的身体、湿漉漉的街上以及工人赌钱消遣的栈房。小说以同情的观点，提出穷苦阶层对未来的冀望不能不寄托于身体。透过男性劳工的视角，注目于年轻女性的身体，虽然其目光尽显恋慕，然而对女性来说此一劳工阶层常见的贫困挫败，几乎也阻碍了婚姻与恋情的可能性；无论是女性或这些男性劳工本身，从劳工阳刚的身体所意识到的未来，却为种种不安的意外阴影所笼罩。二战甫结束不久，社会的“重建”急需劳力，却未赋予劳工任何保护或保障，一次意外就可能摧毁他们唯一的谋生资本——看似阳刚但实质脆弱的血肉之躯，时刻受到潜伏在工作场合中的各种危机所威胁。

从方天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现代工业的生产系统，如何划分两性的身体及空间经验。有一篇以“阿琼”之名发表的小说〈一个排字女工的日记〉（1956年第21期、第23期），以女性劳工为第一人称，叙述、想象女

工在排字部门中的身体经验。透过女工的视角，小说描写她们如何观看自己与他人为铅灰所覆的身体，经由视觉折射的感受，体认到自己隶属于劳工阶层的身分：

排字的男工虽然他们也是技术工人就爱不起来，因为看惯了他们在字房里的样子，就是脱下工房的衣服洗刷得再干净，穿著得再整齐，脑子里还忘不了他们那一身的灰与油墨，而自己给他们的印象恐怕也是工房里蓬头灰发的丑样。……其实灰与油墨有甚么可嫌处，一身灰与油墨正是他可敬可爱的标志。（1956年第23期）

透过复述社会主义改革的自励语言，加以抵销、匡正美丑的观念。作者同情劳工的立场相当鲜明，这篇小说可说是毫不吝啬地颂赞或认可劳工，比如突出工人阶级之间的情谊，从这点来看，方天其实是相当认同社会主义文学的立场。甚至更进一步说，方天还是极为同情那些体力受剥削、处境较为可怜的劳工阶层。他意识到工人阶级并不是均质的，工业生产精工划分的需要，把女工加以分类与分门别类安置在生产单位中，由此带来差异不等的身体与空间经验。工业分类的划分也铭刻在女工身上，各因不同的工作空间，而体现出各自差异的舒张、压抑、释放的自我意识与文化特质：

装钉部的姐妹衣著比较鲜亮，仪容也比较修整；排字房的姐妹则赛似煤渣堆上打过滚来似的。洋货店那边，她们一个个装束得花枝招展，头发是外国明星式的，衣裳是色泽鲜艳浓烈，剪裁得紧身合体，曲线毕呈；……我们这边的姐妹大半不喜欢多讲话，讲话也是细细的声。仿佛长年封在地狱里的幽魂一旦到阳光里也不敢充分显露自己；她们那边则是有说有笑，各逞兜揽顾客的口才，谈得高兴时嘴里夹着整串的英文。（1956年第21期）

除了方天（阿琼、辛生）之外，尚有另一位作者罗紫（宝宝真累人）（《蕉风》1957年第52期）对工人的空间与身体经验书写，亦有相当精辟

的表现。罗紫的写实主义风格与方天颇为相似，对工人阶层的工作细节都有极为精致的考察。这部小说突出城市里的低下阶层，穷得仅能徘徊在生活中最基本的“食”与“住”。一如方天，罗紫也对女工的身体经验有颇为深刻的叙述。制造男装军鞋的女工，各在不同的身体部位体验到疲劳酸痛。各个不同的酸痛部位，也与工人负责的产品部份相对应，由此折射出分工生产的系统，犹如把工人的身体加以分解或分割、工具化役使支配。

除了属于这阶层集体共有的经验之外，方天的小说偶尔也有超出社会主义预期之外的杂音，如个体意识。在一篇有关锡矿工人的小说〈暴风雨〉（《蕉风》1956年17期），虽然结尾的悲剧似乎是典型常见的穷人悲歌，不过小说内对于个体与阶级之间存在的内在约束，却相当隐晦微妙。

小说中来自同一阶层的声言，不断复述穷人的愤怒与不满（比如诉说那些其他人为工作牺牲却得不到认同的例子），但这同一阶级的集体声言却与金发看待自我价值的观点错开了。在马华文学写实主义的小说中，集体共有的遭遇与同情，往往覆盖了个体内在的冲突与焦虑，同一阶级共享的语言，默认了属于群体共有的情感要超出个体自我的意识。主人公金发对守护锡矿的任务表现得异常投入，表面上似乎由于家庭负担所驱，但他对锡矿场出奇强烈的牵挂，却并非养家活口的需要而产生。由于年纪轻轻就被赋予管班的任务，使他感到自己异于同辈的幸运，因而在受到赏识的“召唤”中认同了“尽责”本身即为实现主体（须为他者所承认）的基础所在。但又因为家庭责任的负担，才使得这位年轻管班无法全心投入，而大自然的暴风雨又非人力与简陋的技术所能应付。当然个体所经历的内在折磨，也是由于阶级的不公所致。小说中透过金发这角色寄寓自我认同的价值所在，对个体与阶级之间表面上看似互相隶属，但实际上也存在着疏远的距离，传递出颇为曲折（甚至可能超出作者视域）的意义。

方天在《蕉风》当编辑的时期，新马处于紧急状态。〈暴风雨〉小说也描述了男主人公金发出入新村的情况。自卫团在傍晚七点关闭铁门、主人公金发在夜里离开新村回去矿场，需要获得好几个层级批准，包括村长、马打（警察）和自卫团。一道受到多层监控、限制穿越的界限，由殖民者对华裔族群的防备与怀疑而来。华裔工人在殖民地生活朝不保夕的处

境，以及在面对建国历史时刻的种种焦虑，在方天的小说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分量。

在方天这些后来收录于《烂泥河呜咽》的小说中，并无空间留予缅怀家乡，也没有鲜明的痕迹显露出以中国为祖国的情意结。主人公通常没有多余分文，三餐仅能温饱，无论是国族认同或政治激情，对此贫困交迫的阶层而言，都太过遥远，但出于在地居留的谋生所需，国籍或公民权才成为亟需面对、反思的问题。以辛生笔名，刊于1956年第12期的《蕉风》短篇〈一个大问题〉，时空置于甘榜的黄昏，透过一场在华裔主人公以及两个马来友族之间的对话，小说表达了当时华人申请公民权的诸多障碍。这篇小说里，对话的语言具有融洽一炉的混杂色彩，藉由如此鲜明“在地化”的语言，小说热诚地响应了当时各种质疑华裔融入在地的既定成见，包括他族对华裔落脚地（随时可回唐山的抉择）之不以为然，以及表达华裔不欲回归的意愿。

“地方感的认同”不一定由“国族认同”而来，两者也不必然重叠一致。不同于国族认同是由政治话语所建构，地方感则是由日复一日重复的日常经验与习惯积累，以及加上与当地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也可以使个体对地方产生依恋与认同的情感。然而，即使因为长期居留而对落脚地产生情感，华裔所面对的仍然是“不被认同”的问题。¹⁵正如小说主人公阿兴伯所言，他们需要有合法的公民权在马来亚居留，以便可以继续在此地谋生。然而，恐怕不能因此说，这是一篇“客观反映现实”之作。对现实的理解，乃是为多重社会话语所竞相争夺的诠释，文学所建构的现实，也仅能根据其所认同的价值所诠释的切面。

《蕉风》标明本土路线的写实主义，也显示出这份杂志在去除“中国色彩”的鲜明立场，但个中的本土语境，却不能免除当时马来亚运动之间的磨合冲突。若与当时《蕉风》内并不少见的歌颂国家、热烈认同独立的正面语言相比，方天的写实小说其实包含更多的讽刺、阴影与冲突。在公民权的问题上，各种“交流”其实充满了一连串需要费尽唇舌、说也说不完的“解释”。“解释”虽然可以换来友族友善的“建议”，但所有的“建议”最终指向国家政体建制的本质主义，乃为问题核心所在。小说

在回教堂黄昏的祈祷声中，借助了神的观点来俯视国家体制与个体信仰之间的差距出入，伊斯兰的经文传达公平博爱之意（“真主教我们公平与善，爱你的邻人如爱自己”），但实际上政体已经把“国族”划出等级之分；三方对话在暮色结束后、未能获得满意的解释与解决之道，却仍然互相以“猛得卡”（独立）的口号，来结束这场问题无法解决的对话。

小说内外洋溢的爱国意识，其实都对国家爱得不清不楚：爱国与独立的口号喊得再怎么声嘶力竭，底下却仍然满腔难言的五味杂陈。哪怕对公民权有诸多意难平，此焦虑也依然得与“爱国意识”的热情共同起伏在1950年代马华现实主义的文本中。

置身于1955年的新加坡，一个烙印下殖民者秩序所建构的政体、华裔移民处于抉择祖国/本土认同之间、南洋新马的国籍边界正逐渐形成（对比以前的边界不明）、而祖国/中国的政权易变，《蕉风》宣告“纯马来亚化”文艺主张的创刊号，对甫到新岛落脚的离散者来说，这快速的认同转移犹如一道切割的界线，随著其地理移动，在越界之后迅速嵌入其语言之中。方天无疑是《蕉风》的作者当中，其身世、立场与文学特质最特殊的一个。与马摩西、陈振亚等其他作者相比，方天的写实主义竟然有夹带更多的社会主义特色，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加入到被文坛目为倾右的《蕉风》阵容中呢？无疑方天的小说技法殊为讲究精致，而他父亲对中共的叛背、在香港《中国学生周报》的任职经验、以及他与申青等人的相遇以及文人圈子之间的互动，都使其在抉择认同的路径中变得更为复杂。中国易权后，离散者由北到南，在不同的地理纬度经验了现代性与殖民时间差异的断裂，香港和新加坡表面上看似接近，然而前者的殖民地时间还相当漫长，而后者却已至英殖民地的尾声。正如他在《蕉风》创刊号中发表的短篇小说，一篇并非现实主义的〈一八四一年的一夜〉，这场回溯锁定了时间的定点，试图捕捉往昔那极为关键的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刻，1841年也是香港英殖民地开始的时间。这篇小说虽然写得拙劣简陋，但却是方天在《蕉风》开始的第一篇作品，透过对往昔的遥想，对故乡的缅怀仍见其痕，同时又可见他对各行各业、种族、语言与口音混杂的空间相当好奇。那时候冷战形势正跨越区域涌动，伸延到印刷刊物与文坛之中，在台底下

形成不容声张的角力，而左翼的意识仍然支配整个文坛，而非左翼的势力还在寻找渗透之道。在东南亚，殖民地的独立意识兴起，单一的国籍观念出现，语言与国籍设下种种边界来重塑国家主体，南来者不得不与往昔彻底“告别”，去面对行将独立建制的国家主体。

五、结论

方天在一篇评论戏剧的文章〈评“剧作选辑”中的诸剧〉里，提出对写实主义艺术与技巧的要求，比如故事需在铺排情节与细节上入情入理等等（《蕉风》1956年第25期）。他在刚抵达时发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尚且流于借助戏剧性的元素，比如在结局时透过撕心裂肺的呐喊表达穷人的悲惨处境（如〈暴风雨〉，1956年第17期），但在后来的小说相当节制表达“悲痛”，尝试将悲愤在小说内转以更深沈的方式来表现，举例有1956年第24期《蕉风》〈烂泥河的呜咽〉、1957年第30期〈预感〉。有趣的是〈预感〉篇里，向来应该位居旁观的叙述者在小说中现身，使得小说与过去往常贴近工人的视角不同。透过主人公与友人对“不幸预感”的辩驳，使得往常在方天的写实小说中那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厄运”，被抽离出来，成为一个可被加以审视、反省的现实意识。

1950年代马华文学现实主义所要“再现”的现实，乃是一套酿制高潮与同情心的叙事模式，“厄运”往往是主人公不可避免的悲剧，故事往往要把主角推往无助的境地以引起悲愤。在〈预感〉这篇小说里，主人公对厄运的注意，既是迷信，也是弥漫在殖民地都会中的现实感知，“一切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事都有发生的可能”（第30期接封底内页）。受意外阴影笼罩的，不仅限于劳工，也可以是任何人，在当时当地——。标志现代性的机械技术已经来到，但对殖民地的子民来说，那还是无法自主、凡事都还没有保障的时代。厄运虽未发生，却已被认定了迟早要发生，成了等待应验的预言，在现实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就像它已经写在写实主义的故事中那样，这种对悲惨下场的期待，竟然成为方天的现实主义书写中、一种可预期的、体会现实的模式。

方天的写实主义，不免受到整个文坛离散南来的社会主义式的现实主义观点所限：没有厄运，则没有故事。没有阶级，也没有现实。在国籍与边界长成之际，语言与文化疆域也立起围篱，离散者的漂泊或游离状态必须尽快结束，没有可以明确的国家作为认同的对象，几乎是不可思议也不正当的，这一切是如此地理所当然、难以质疑或想象其他可能：没有国家认同，则没有文学主体；文学主体，竟不得不依附在对国家主体的认同上。当现实主义书写为迎接独立正面、乐观的意识所包裹，对这地区的叙述同时植入了国家政体与阶级关怀的话语。一方面，对阶级问题的讨论，都得寄寓于谴责针对殖民者的不公（殖民者有如统治 / 资本阶级）上才能表达出文学的关怀，另一方面，对国家建制的问题却又得借助爱国意识才能展开叙述。

方天所能达到的突破，是在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上着手，比如把厄运与悲剧经营得更为内敛潜藏，在少数的短篇小说里，他“看见”主人公是个孤独的个体，使个体的意识浮现，因而得以与阶级的共同体意识忽然拉开距离。但这距离太过微小，在集体话语的浪潮中消失。这样的跨越，在他的小说中时而浮现，非常珍贵，却也在阶级与爱国主导的现实框架中有所局限。

注释

- 1 这当时也是全民整体性的运动，以建构国族的认同，尤其在战后，联盟政府鼓吹马来亚认同、和谐友好的论述，具有修补种族裂缝的作用，马来人与华人的关系在日据时期加剧分裂。如在联盟政府结盟之初，翁惹阿化就提到需要重修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这类话语也贯穿整个争取独立时期的爱国运动中。见Joseph M. Fernando (2012: 280-301)。
- 2 自1948年的马华文艺论争以后，脱离中国的附属地位、建立在地文学的主体性，变成极之重要的马华文学普遍具有的意识（赵戎编1971: 192）。本土化的马华文艺观点大致“胜出”，“侨民文学”则渐失吸引力。由国籍而诞生的国家意识，广泛影响文坛，故提倡这观点的也不只是《蕉风》。爱国激情当时在文坛上倾泻如注。可参见潘碧华的论文〈马华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反思〉(2008: 62-67)。
- 3 参考张锦忠2007〈文学离散与马华文学的写实主义〉摘要：“这些离散文化人将身体放置到另一个文化与空间，从而试图（以作为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写实主

- 义)操纵这异文化空间的书写生产活动。”
- 4 这里也参考黄锦树批评方北方现实主义局限的意见，认为方氏的现实主义流于认同国阵宣导的国家主义，而压抑了历史意识。其他限制也包括美学缩减(1998: 178-210)。
 - 5 由于英殖民者意欲在中共与美国之间保持平衡的关系，使得香港在冷战时期形成极其独特的文化交汇与竞争空间，可参见郑树森与单德兴的研究(郑树森，2007: 178; 单德兴，2007: 109-133)。
 - 6 《人人文学》刊行时期为1952年5月20日至1954年6月1日，由香港人人出版社出版，“人人”和香港的“友联”都曾经接受美援“亚洲基金会”的资助(郑树森，2007: 167)。
 - 7 参见1956年第16期《蕉风》封底内页的说明。
 - 8 读者普遍认同马华文学在地化，书写在地的事物、地方、生活等等，但与此同时，有者也仍然保持情感上对祖国(中国)的认同。比如从1956年第12期开始，连续三期刊登的游记，来自新加坡的作者紫燕撰《马来亚去来》，文中的祖国意识：“我们绝大多数是侨生于南洋，也没有回过祖国，住在‘长年都是夏’的星洲，不知祖国凉爽的天气是给人怎样的一个享受。”(页21)
 - 9 有关这本文集的介绍，参见曾铁忱在该书的〈后记〉，是《南方晚报》为创刊五周年纪念的征文作品集。亦可见马汉，〈正经800：报社举办的征文比赛〉，《南洋商报》“副刊商余版”，2012年6月16日。
 - 10 西方理论颇多阐述现实主义的特质。写实主义的反映论视符征直接等同符旨，“写实”其实是特定运用语言的方式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并不在于它是否确实符合现实，往往是其风格、语言与结构的方式，使读者产生如实的幻觉，对文本信以为真，而忽略它生产的过程(Rosalind Coward and John Ellis, 2000: 595)。
 - 11 如方修的观点，他认为低级的现实主义是止于客观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批判性的现实作品要高一级。(方修，1976: 20-31)
 - 12 从这些场合中的发言，亦明显可见方天认同纯马来亚化的文学观点，他强调要开拓独创性，对此，方天还描绘了相当浪漫的想像：“生活像一片浩瀚的海洋，海洋上震盪著无垠的绿波，在绿波的下面有森林，有暗礁，有火烧的挚热在地壳上震颤着。如果我们满足，或止于模彷，那么我们只能掬起一团飘流着的水草木片，或者捡拾一些沙滩上的贝壳，此外什么也不能得到了。”见“一九五七年马华文坛的展望——文艺座谈之五”(《蕉风》1957年第29期，页5、20)。
 - 13 有一位作者傅清评马摩西的《集愚集》说他善于写日常生活家常琐事，“凡是这一类以‘我’为中心的文章，都写得亲切细腻。”(页17)甚且将之与周作人比较，“没有火气，总是平平稳稳”(页17)(《蕉风》1957年第41期，页16-17)。马摩西书写个人的琐事，确实语调平静，其对地方感与流动的观点亦甚为特殊，将另撰文讨论。
 - 14 长久以来，新加坡河其周遭地区的空间阶级属性已经积淀了悠久的历史。新加坡

河本身也是码头运货穿梭的路线，也是苦力生活的居处。它由南至北，把城市划为东西两边。在英殖民地二战以前，南来苦力多聚积在新加坡河周遭，四周围多是轻工业（James Francis Warren: 2003, 39, 261）。

- 15 参考张锦忠，“马来（西）亚民间华社在文化属性与政治认同的问题所在，不在于认同，而在于不被认同。”（2003: 110）

参考文献

- 方天编1955-1957。《蕉风》第1期-第52期。新加坡：蕉风出版社。
- 方天1957。《烂泥河的呜咽》。新加坡：蕉风。
- 方修1976。《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新加坡：洪炉文化。
- 白垚2003。〈浮槎继往传黄石——历史蕉风，当年的创刊意识〉《南洋商报》，9月8日。
- 高全之2008。《张爱玲学》。台北：麦田。
- 黄锦树1998。《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元尊。
- 以多1959。《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新加坡：南洋大学创作社出版兼发行。
- 蓝屏等著，曾铁忱编1956。《马来亚之恋》。新加坡：南方报社。
- 潘碧华2000。〈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对马华文学传播的影响（1949-1975）〉。载黄维梁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747-762。
- 2008。〈马华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反思〉。《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6:5:62-67。
- 单德兴2007。《翻译与脉络》。北京：清华。
- 谢诗坚2009。《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槟城：韩江。
- 姚拓2005。《雪泥鸿爪》。吉隆坡：红蜻蜓。
- 张锦忠2003。《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
- 2004。〈重写马华文学史，或，离散与流动：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载《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南投：国立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 2007。〈文学离散与马华文学的写实主义〉（Literary Diapora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Realism in Mahua Literature）。中山大学人文中心离散论述研究群组计划。<http://zephyr.nsysu.edu.tw/researchcenter2/document/060908%20%E5%BC%B5%E9%8C%A6%E5%BF%A0%E8%80%81%E5%B8%AB%EF%BC%BFLiterary%20Diapora%20and%20Realism%20in%20Mahua%20Literature.doc>
- 赵戎编1971。《新马华文学大系（第八集史料卷）》。新加坡：教育。
- 郑树森2007。《从诺贝尔到张爱玲》。台北：印刻。
- Chamberlain Iain 1994. *Migrancy, culture,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James Francis Warren 2003. *Ah Ku and Karayuki-san: prostitute in Singapore, 1870-1940*.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Joseph M. Fernando 2012. "Elite intercommunal bargain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role of the Communities Liaison Committee in Malaya, 1949-5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3(2): 280-301.
- Leo Suryadinata 2007.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outheast Asia Studies.
- Lippard L 1997. *The Lure of the Local: Senses of Place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Rosalind Coward and John Ellis 2000. "From Language and Materialism: Developments in Semiology and the Theory of the Subject".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al approach*, edited by Michael McKe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593-599.